

在這個部份，我們討論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在中國轉型期內所具有的特性和發揮的功能。討論的起點將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開始。在鴉片戰爭中，中國失敗了；於是中國人開始檢討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也重新規劃組織中國。這個工程很辛苦，費了相當長的時間，雖經過了一百多年，這個工作仍未完成，中國還是必須努力轉型。知識份子的貢獻很多，工商業者也有相當大的貢獻。

一般而言，工商業者與知識份子在這一百多年來，並不是兩個區隔分明的社群；現代企業的工商業者與知識份子之間，更是交纏在一起。

在一八四〇年之前，亦即大約一八〇〇年左右，中國在經濟上的優勢，便是從國外賺取的大量白銀以及其他的資源都已呈現逆轉。第一波的轉變是鴉片貿易；英國不再有足夠的現金來買中國的產品，他們體認到要平衡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相當困難，而且也無法免費地從墨西哥取得白銀；美國雖有自己的物產，但對大量的白銀流向中國，也感到有些吃不消；當時全世界發生了銀錢比價失衡的情形，在歐洲也造成白銀價格飛漲。為了平衡與中國的貿易，英國先是將印度與中東的貴重物資（例如珠寶等）賣到中國。後來，英國人發現中國中藥裡有使用鴉片，於是開始在印度與土耳其種植鴉片，運銷中國。他們也發現鴉片會令人上癮，因此銷貨量有增無減地大量輸入，很快地在不到廿年內便平衡了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而一八〇〇年以後，貿易關係便開始出現逆轉，中國購買鴉片的支出已大大高出於所賺回來的資金了。

第二波自一九〇〇年起，各國開始以工業製品大量地賺走了中國人的錢財。以機器大量生產的貨品，尤其是印度棉花紡織的棉布，以及點燈用的煤油等，都是有利潤的商品。中國經濟於是有了逆差的情況發生，最吃虧的便是農民了。中國從漢朝開始，手工業的生產一部分在城市、一部分在農村；除了瓷器、鐵器外，其他如家具、鞋子、農產加工品以及服飾等，大部分係由農村提供。農村工業的產品漸漸被外來的機器工業所取代；其中最明顯的要算紡織產業了，不論是麻布或棉布，機器製品總比人工製的品質要好得許多，而且更便宜。因此中國農村除了耕田外，工業的生產便完全靠外包了。

這對中國而言，是個相當大的轉變，這個轉變也導致城市和農村的脫節。許多小城鎮原是全國交易網的中間站：農村物資集中於小鎮，小鎮的物資轉向城市，最後流向全國重

要集散點，再將物資分流出去。中國農村的「趕集」，主要就是收集農村的物資再轉賣到城市，又將商品分銷於農村。這樣綿密的交易網需要一些中間城鎮來轉輸。外來的商品入侵中國市場，中間城鎮的功能便告萎縮，所以全國只剩沿海的大城市逐漸發達，其他的小城小鎮以及農村便日趨凋疲。鴉片本身的害處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用再贅述。到了一八四〇年，太多人吸鴉片的情況，使得道光皇帝不得不支持林則徐禁煙，可惜中國打輸了鴉片戰爭。對中國來說，戰敗已吃虧，但是比起國外工業產品大量入侵的情況，卻是小巫見大巫：國外工業產品入侵，等於拔了中國經濟的根，其影響是深遠的。

在社會方面，過去的科舉制度讓農村優秀子弟有出人頭地的機會。風水輪流轉，如果有錢人的子弟自甘墮落，往往家資會愈來愈小。民間的才智之士可望透過科舉求取功名，耕讀世家的知識份子，也能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民間階級上下流轉，能上的上、該下的下。但到了清朝，民間階級的流轉趨勢便緩了下來。清朝的高官主要都是滿清人出任，到了晚期更是出現了捐官制度；正因為這兩種制度，使得過去以科舉制度做為人才升降的機制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至少當時的農村及小城鎮都還雇得起老師，以設置書院與書房。在農村尚未凋疲，小城鎮尚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時，地方教育總還能維持下去。等到農村與內地城鎮的經濟開始衰敗，這類的教育體制便形同瓦解，民間教育水準於是一落千丈。

直到鴉片戰爭失敗，中國遂逐漸走向革命。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廢除以後，過去求取功名的管道便完全斷絕。當時，就只有那些供得起子弟上學的家庭能念書。一個縣市最多只有兩、三所小學、一所中學，如果想求學，往往得離鄉背井，離開農村到外地去。而對當時農村家庭而言，喪失了勞動力，還得付學費，在經濟已經衰敗的情形下，一般家庭根本無法維持，於是教育便成了有錢人的專利，貧窮的人家沒有求學的能力，因此農村成了又窮、又沒知識的地方。

假如從一八四〇年到一九〇五年取一中間點，以一八八〇年開始計算，當時半個世紀的中國，幾乎全都是這樣的情況，於是社會變成兩種截然不同的階級，一是大多數的農民擠在窮困的農村裡，他們沒有知識，也沒有升級的希望，且農村經濟正不斷地凋蔽。算算傳統的情形：一個農戶的非農收入，往往佔其總收入的四十%，其中包括男耕女織等收入。當外來的機械工業產品搶走農民生計後，每一戶農民只剩下六十%的收入可以過日子，也

因此而導致農村社會愈來愈貧窮。

在城市方面，幾乎是靠外來物資、對外貿易以及小工商業等經濟為主，最繁榮的城市要屬上海。一九三〇年的上海是相當風光的一個城市；但這樣的繁榮卻是建築在借來的資本、借來的技術及文化上，根本不是自己的。當農村愈來愈窮，而大城市愈來愈繁榮，兩者之間的距離便愈拉愈遠，受教育與未受教育的距離也逐漸加大。全中國約有十五％的人過的是相當豐足的日子，而三十％的人（包含前述十五％的人）只能溫飽，其餘七十％的人之中，有一半人口處在半餓半飽的階段，剩下的一半人口則是赤貧階級。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想要建國，想要在世界上爭個立足點，就必須要建立自己的工商業，還要建立起交通和教育制度，把國家推向世界潮流。這些浩大的工程，全部都落在那十五％的人身上。但這些人當中，又只有非常少的人受到足夠的教育。以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的清華大學來說，當時全校才只有幾百名學生。這些為數甚少的知識份子往往出身在上層階級，靠其父兄之餘蔭，才有機會上大學。讀書的權利，既侷限於極少數的人身上，農村子弟幾乎是沒有求學的機會。一般人的子弟充其量最多也只念到中學而已。因此，推動中國近一百年來前進的，便要靠這少數的知識份子。